

摇布衣人生 轱明德编撰—北京 北京出版社 圆园园源
摇(人生中国丛书)
摇陈星苑原明哲原慧园原惠

摇 I 鄞布... II 鄞朱... III 鄞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摇 IV 鄞随记类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爱数据核字(鄞五原第 鄞鄞鄞号

· 人生中国丛书 ·

布衣人生

月哉再陽陳羣茶耕羣郎

朱明德摇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远号)

邮政编码: 550000

网 摇 址 : www.zengyuan.com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愿园伊园猿猿猿开本猿远猿印张猿愿千字

圆国原年 缘月第 员版摇摇圆国原年 缘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 员—缘园

陈月苑原墅园原缘裁园原愿
陨愿瑶定价员愿元

布衣精神

- 笑对死神——“灰学之王”投掷“文化原子弹” 叶辉（猿）
良医之道并不孤 李菁 许玮（员）
回家——一个画家教授与一个上访农民的故事 朱维民（园）
“工人作家”冯大成 聂鑫森（猿园）
一个被偏见连累的斗士 翟明磊（猿）
若兰若金的平凡人生 刘康达（源）

悠悠岁月

- 成长就是历尽重重心劫 口述 常乐 整理 木樱（缘）
书架上的战争 朱大可（源）
我有一个理想 花无忧（苑）
我的那段“传奇”岁月 瞿花乍现（苑）
只想给孩子们一个希望 冯艾（愿）
我就在你身旁 洪生（愿）

真情一隅

- 终极之爱 蔡玉明（怨）
午夜摇飘零着伤心的花瓣 千夫长（员园）
一支唤醒生命的歌 李霁宇（员源）
小站风雪夜 恒言（员愿）
二十九条蜈蚣 方冠晴（员怨）
我们是鸟儿，鸟儿只知道飞翔 吴若桐（员园）
父亲的谜语 刘蕊（员园）
三件不能让母亲知道真实结果的往事 阿健（员园）

生活碎片

四个乡村教师的现实	刘天时 (员缘)
五分钱的仇恨	张敏 (员源)
别一种滋味	向国平 (员源)
我丢失了三姐的新伞	刘立稳 (员缘)
“神童”三弟	陈帮和 (员缘)
生如春花之灿烂	王石平 (员源)
洁白的木槿花	陈永林 (员源)
苑园岁的父亲和 怨园岁的爷爷	高阳 (员缘)

人在旅途

最漂亮的雪人	子川琪 (员苑)
我在远方理解了故乡	老蛋 (员苑)
母亲来住的日子	锦志 (员苑)
有温度的词汇	艾苓 (员苑)
娘亲似金	马德 (员苑)
兄摇弟	梅子 (员苑)
奶奶的跛脚	章印华 (员苑)
我那短命的北京生存	黑猫 (员缘)
母亲的头巾	冰戈 (员苑)
一个夜晚	袁小虎 (员苑)

笑对死神 ——“灰学之王”投掷“文化原子弹”

叶摇辉

1995年10月10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病榻中亲笔给一个叫孙万鹏的人写信，信中称：灰学是一门新学科，是一门大有前途的理论。

何谓灰学？为何大科学家抱病仍给予灰学高度关注？

关注灰学的岂止科学家，李鹏委员长在全国政协的一次春节茶话会上肯定并赞扬说：“灰学系统理论很有意义。”朱镕基总理在视察三峡工程时曾问：“灰学理论在三峡工程中的应用情况如何？”

1994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不确定问题研讨会上，关于灰色系统的专题发言引起了轰动，相关材料被索一空。

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市均设立了灰学理论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等100多所大学和台湾所有大学均已开设灰学专业课程。

令国人骄傲的是：这一热门学科是一位名叫孙万鹏的中国人创立的。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孙万鹏是在身患肝癌、被医学“判处死刑”后才创立这门学科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当这门学科在中国乃至世界广泛传播时，癌症竟神奇般地从孙万鹏身上消失了。

全国最年轻的

农业厅厅长生命告急

1988年，28岁的孙万鹏就任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农业厅厅长、浙江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中组部已将其列为省部级后备干部。

“后备”不久，农业部就盯上孙万鹏了，欲调他出任副部长，但被浙江省委给顶了回去：这个干部我们自己要用！

这位浙江“自己要用的干部”带领省农业厅率先在全国开展机构改革。

掘布衣人生

1983年 怨月，孙万鹏打报告向省委伸手“要官”，要求到县里担任县委书记，亲自搞一个农村改革的试点。省委书记王芳对他的举动非常赞赏，批准了他的要求。

1983年 10月，在孙万鹏的大力推动下，黄岩发出了全国第一个发展股份制经济的文件，奠定了黄岩经济发展的基础；设立了全省第一个教师接待日，为教师排忧解难；建起全国第一个县级机场……他的作为在浙江反响强烈，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一颗新星在浙江政坛冉冉升起，人们称他是浙江的李向南，是清正廉洁的爱民书记。

然而，没人能够想到灾难会猝不及防地降临在孙万鹏身上。

1985年底，孙万鹏到杭州参加例行体检后刚回黄岩的办公室，杭州的电话就追过来了：马上回来，重新检查！

我的身体能有什么问题？他不以为然。

第二次、第三次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揪住他说：“立即住院！”

原来，他患上了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这坏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孙万鹏炸懵了：自己一向身体健康，怎么可能得癌症？

那几年，癌症频频袭击孙家：1983年，父母双双患上癌症，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1985年，妹妹得了肝癌，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孙万鹏的肝胆相连处出现一个肿块，位置与妹妹的几乎相同。

孙万鹏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抱着一丝侥幸穿梭在杭州各大医院，又到北京进一步检查，然而结论却惊人的一致。医生判断，他只能活一年多！

源6岁，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但他毕竟是坚强的，他开始按轻重缓急处理后事。他最放心不下的是黄岩，在病床上，他写下了猿万多字的公开信——《致黄岩敬爱的广大干部群众》。

他的搭档、黄岩县县长来了。握着孙万鹏的手，这位铁汉子县长双眼湿润了。生龙活虎的同伴转瞬间竟被癌症击倒在床，怎不令人痛心！

黄岩县教委主任受全县师生的委托前来探望孙万鹏：“得知您病

了，全县 15 万师生正在发起募捐，一定要把您的病治好！这是全体师生给您的慰问信。”当年，孙万鹏跑遍黄岩各区的学校，对教育的关心是黄岩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亲友一个接一个前来探视。

繁杂喧嚣之后，病房里的夜是孤寂的。探视不就是最后告别？难道就这样了此残生？孙万鹏心有不甘。他扪心自问：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我还能做什么？

他想到了灰学。

按国际惯例，在系统论和控制论中，以颜色显示信息度：信息确定（已知）的为白色，不确定（未知）的为黑色，部分确定、部分不确定的为灰色。

灰色理论就是以信息不完全的灰色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运用特定的方法描述信息不完全的系统并进行预测、决策、控制的一种崭新系统理论。

1984 年，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邓聚龙教授发表的论文《灰色系统的控制问题》，曾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

细读邓教授的论文，孙万鹏发现，这个新理论首次以数学语言揭示了灰色系统理论内部的逻辑关系，但它仍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他认为，哲学是所有学科中的贵族，如果从哲学的高度观照灰色系统，灰学才能成为一个新学科而达到完善的境界。不过，他当时无法放弃繁琐的行政工作去研究灰学。现在，疾病为他提供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想：何不利用余生研究灰学，著书立说？

此念一出，孙万鹏顿感豁然开朗，那笼罩在他人生旅途中的彷徨、困惑的阴霾消散了，他跳出了生离死别的悲切感伤，心海慢慢平静下来，精神进入了更高的境界。他让家人把书和资料搬进病房，然后开始研究。

病房中的新生活开始了。孙万鹏没有料到，这竟是个辉煌的起点。

以垂危之躯

投掷“文化原子弹”

摇摇 绝望是人生最严重的癌症。孙万鹏曾听过这样的故事：体检

时，张李两人中一人得了癌症，却被张冠李戴。未得病的张被告知患有癌症，结果终日恍惚，精神萎靡，而真的得了癌症的李却浑然不觉，终日欢乐，再次检查时，张真的得了癌症，李的癌症却消失了。

笑是治病的特效药。这使孙万鹏想到灰学中的“迭代”理论——千万次重复同一坏的或好的因素，事物的整体也会变坏或变好。他想：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欢乐这只蝴蝶的美丽翅膀经常扇动——不断“迭代”好的心情和好的信息，让体内的龙卷风把癌细胞卷走！他心情开朗起来。

然而，病魔不饶人。1993年怨月，孙万鹏病情加剧，医院决定给他动手术。

一听说要动手术，孙万鹏马上想起父亲和妹妹都是术后不久就离开人世的。自己做不做手术呢？他想到了灰学的“非唯一性”原理：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有局限性，就如父亲和妹妹把开刀作为治疗癌症的唯一方法，结果都走上了不归路。有了灰学理论的支持，他做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放弃手术，采用灰学中的综防学，将中医、西医、气功、食疗综合运用到自己的治疗中。

孙万鹏毅然出院，于国庆前夕回到了家。

出院后，孙万鹏争取生命的密度，与死神抢时间，用所剩不多的生命写作，把著书当成写遗嘱。

1994年元旦前夕，孙万鹏对妻子吴文上说：“我的时间已剩下不多了，我最大的心愿是把研究灰学的成果写出来，现在要做最后的冲刺了。你……能支持我吗？”

吴文上强忍泪水点了点头。她与孙万鹏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同班同学，19年来夫妻相濡以沫。她太了解丈夫了，他一旦作出决定，就会不遗余力地坚持下去。

“好。从今天起，我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你给我准备几件东西：一条灯笼裤，我写作时穿；5盒清凉油和5公斤干辣椒……”

“要干辣椒干什么？”吴文上惊讶道。

孙万鹏笑了：“提神。另外，准备几捆蜡烛，万一停电就可以用了。还要一个小闹钟……”



摇摇猿猿年愿月愿日，孙万鹏与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右一）、北京市原市委书记林乎加（左二）、农业部副部长刘成果（右一）在一起。

猿猿年元月猿日上午，孙万鹏铺开稿纸，写下《表现学》一书的第一行字……

写了没多久，孙万鹏就感到疲惫不堪，于是把手伸进书桌旁的辣椒袋，取出一枚干辣椒嚼起来。顿时，他感到嘴巴里像爆发熊熊烈焰般灼热，嘴巴张开合不拢，随之，一股灼热冲上脑门，又涌向全身，引发浑身燥热，眼泪鼻涕全流出来了。他强忍着，又把满口的辣口水咽下去，顷刻间，他觉得五脏六腑也燃烧起来。这一辣，把他的每个细胞都激怒了。辣过之后，他出了一身汗，一种奇怪的感觉出现了：疲倦顿消，全身竟莫名其妙地舒坦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孙万鹏的写作已难分白天黑夜而变成“灰色”的了，毫无规律可言，完全视他的身体状况而定，他常常在半夜感到身体舒适一点儿就马上起床写作。他已到了完全忘我的地步。一天，吴文上在单位给他打电话，可家里始终没人接，她吓得赶紧往家里跑。回到家，她发现丈夫沉迷于写作，连电话铃声都没听见。

孙万鹏将生死置之度外，精神得到极大的升华。奇迹产生了：成熟的思考使得他写作时连草稿也不用打，落笔便成章，知识之泉顺着他的笔端源源涌出。

苑月愿日凌晨，孙万鹏的第一部灰学专著——圆原万字的《表现学》终于完成了。邓聚龙教授称之为“灰色系统理论研究的新里程

摇布衣人生

碑”。

谁也没有料到，这部被孙万鹏当做“遗书”写就的专著竟成为灰学的出生证。

不久，孙万鹏的第二部专著《灰色价值学》脱稿。

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这两部专著，《人民日报》等源园多家报纸发了消息，邓聚龙教授称孙万鹏的灰学专著“不啻是一颗文化原子弹”。专家们认为：这两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灰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诞生了。

孙万鹏成了灰学的真正创始人。

在家庭病床上

缔造生命奇迹

摇摇 员994年春节前夕，深圳一家服装公司开联欢会，兴高采烈的员工轮番表演节目，轮到驾驶员孙忠阳时，这位 圆园出头的青年缓缓站起来，张了张嘴，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孙忠阳是孙万鹏的长子。在头一天，他才得知父亲身患绝症的消息（家里一直瞒着他，要不是同学打电话给他，他还蒙在鼓里）。他想赶回家探望父亲，但母亲劝他不要回家，说：“你与其回家，还不如把路费省下来给你父亲治病。”

作为厅级干部，孙万鹏家的经济窘境难以为外人道。他的两个妹妹都下岗了；妻子是由兄长养大的，她当知青的哥哥后来在农村成了家，家境非常窘迫，兄妹们都要孙万鹏夫妻接济。有人让孙万鹏给老家的领导打招呼，好安置一下他的亲人的工作，但他不同意。他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只好当临时工；二儿子高中毕业后回家照顾父亲。一次，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刘锡荣去探望孙万鹏，得知这一情况，感慨万分：“万鹏，向组织提出来吧，你两个儿子组织上至少可以安排一个。这不过分。”孙万鹏摇了摇头：“靠他们自己吧，人生的路总要他们自己去走。”

小儿子后来读了园林设计专业，毕业后到深圳找工作，开头几个月他工作无着落，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那时孙家的经济异常困难，以至于每个月的月尾，吴文上都要楼上楼下向邻里借钱维持生活。日子虽苦，但孙万鹏夫妻却苦乐与共，从不争吵，共度人生

难关。

但有一次孙万鹏发火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吴文上使用的是一辆购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26 英寸自行车。这车老得掉了牙，常常掉链，吴文上经常弄得满手油污。农贸市场上的农民取笑她：“你这辆车给我们运菜都嫌差，你还在骑？该进博物馆了！”

一次，孙万鹏看见妻子又是满手油污地走进家门，再次感到非常内疚：“别人的妻子穿金戴银，而你跟了我只有受苦，太委屈你了。买药是无底洞，不要再把钱花在我身上了。对你，我这一辈子已无以为报。你也要为自己想想啊，留点儿钱给自己和孩子吧。你骑这么高、这么旧的车很容易出事的，还是买辆新车吧！”

吴文上深情地望着丈夫说：“你就是我的骄傲，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美满，我很知足了。自行车是旧点，但还能骑。”后来见丈夫态度非常坚决，她也就开始筹划买新车。

钱慢慢凑齐了。然而，吴文上又用这笔钱买了药：她到广西出差，见绞股蓝便宜，就买了一大包。

孙万鹏一下子火了：“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别买药、别买药，你就是不听。这绞股蓝我不吃了！从今天起我什么药都不吃了……”盛怒的他将那包绞股蓝往门外扔去。

吴文上一把抱住丈夫说：“万鹏，万鹏，千万别生气，别气坏了身子，我下次不买了，不买了……”

见妻子泪流满面，孙万鹏突然愣住了，又猛地抱紧妻子，哽咽道：“文上啊，你也该想想自己……”

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孙万鹏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期，他时常感到灵感勃发，文思泉涌。从 1985 年至 1992 年，他的 10 余部灰学专著陆续写成。

在专著一部接一部面世的同时，孙万鹏感到自己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体内生命抗体日益强盛，肝部的疼痛逐渐消失，精神也好了起来。1993 年，他到医院检查，医生大吃一惊：他身上的肿瘤竟奇迹般消失了！

这确实是奇迹——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医生无法做出解释，科学也无法做出解释。

孙万鹏认为：“温馨的家庭病床”是去病的关键。他家里没有任何干扰健康的因素，既没有医院里病人痛苦的呻吟，也没有病情恶化信息的相互传递，这使他的心境一直处在良好的状态，而精神状态良好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孙万鹏创立了灰学，灰学也救了孙万鹏。按灰学综防学理论的中西医、气功、食疗并用的综合防治法功效不凡。吴文上一一直帮助丈夫坚持食疗，凡对癌症有疗效的食品，坚持每天给他吃，如每天吃缘至员园克西洋参、吃西红柿、喝绞股蓝泡的茶等。他呢，在温馨的家庭病床上边治病，边研究，边写作，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一个人能忘掉自我，忘掉疾病，忘掉生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在忘我者面前，癌症逃遁了。

孙万鹏在灰学中涅槃，一个新的孙万鹏诞生了。

员怨愿年，《第三种科学》出版了！这部专著是灰学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专家们称它“是人类科学思想一场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与第一种科学（以培根、笛卡儿、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和第二种科学（现代科学）相比，第三种科学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科学观，是一套新的科学描述体系。

传统科学可称为“白学”。现代科学可称为“黑学”，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则是灰学。这是孙万鹏总结员园年灰学研究的结晶。

员怨愿年员园月员缘日，在中宣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孙万鹏灰学理论及文集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徐光春对孙万鹏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刘云山说：“你不生病，也可能与我们一样，做个副部长。但是，在我国，省长、部长多得很，灰学创始人却只有你一个……”

（原载《家庭》）

良医之道并不孤

李菁 许玮

从某种角度而言，桂希恩不是一位很好的采访对象——尽管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而言，他堪称一位标志性人物：1993年，桂希恩来到豫南一些乡村，确认当地流行的一种“怪病”实际上是艾滋病，“血浆经济”造成的艾滋病灾害由此开始为外界所关注。但桂希恩的低调与他的经历和身份形成极大反差，他拒绝描述去艾滋村所遇到的波折，拒绝计算几年来他为艾滋病问题所做的个人投入，拒绝记者对他内心世界的挖掘。实在迫不得已，他只会将话题引向艾滋病，而不希望集中在他个人身上。所有这些，使得桂希恩身上笼罩了几分神秘色彩，却也更加重了他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分量。

最近，一向不喜欢抛头露面的桂希恩又一次“无奈”地面对媒体：1994年 圆月 圆愿日，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亲赴武汉，把专门用来表彰为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贝利 原马丁奖”颁发给桂希恩，而桂希恩将 缘园园美元的奖金全部捐了出来，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作为配合医院有关艾滋病宣传活动的一环，桂希恩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但在采访的最后，桂希恩竟然说了句类似恳求的话：希望你们笔下留情、实事求是，不要将我夸大。

“一个人对别人的痛苦如果无动于衷，他就不配称人；一个医务人员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桂希恩如是说。

“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桂希恩在很多场合这样表述：发现文楼村（即后来俗称的“艾滋村”），以及之后参加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上天对他的一种眷顾，“如果别人比我先遇到，他们也会这样做的”，“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常常讲，我做了一些事，那些没做这些事的人只是没有到现场、没有接触到那些现实，人总是有同情心的，我碰巧遇到了这些机会而已”。



1985年 10月 15日，桂希恩获得“贝利—马丁奖”

1981年，美国发现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当时正在美国进修的桂希恩知道这种病是通过同性恋传播以后，曾经很自信地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桂希恩可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会成为中国艾滋病问题上的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

1983年 7月，在中南医院进修的一位医生因为老家乡亲们得的一种“怪病”而向桂希恩请教，病人大部分是青壮年，症状是发烧、拉肚子，很多人莫名其妙地死去。桂希恩去了这位医生的老家，也就是后来尽人皆知的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在发现当地病人的临床表现很像艾滋病以后，他采集了 5 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检查，结果其中两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已有不妙预感的桂希恩再赴河南，抽血范围扩大到 50 多人的时候，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桂希恩立即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赶快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他们的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病人；基层政府没有管住非法采血，以至于造成艾滋病的大面积出现，如今应该做些弥补。

三个月等待过去了，桂希恩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当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是杳无音信，而且桂希恩再去河南也遭遇了相当

的阻力。在写给当地政府的信中，一向温和的桂希恩着实感到愤怒：“你们这里出了事，自己不管，也不让别人管，这个政府还是不是人民的政府？”

1993年10月底，桂希恩带着他在文楼村的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直至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副总理在上面作了批示。“我其实是个很软弱的人，但应该做的事就一定做到底。”桂希恩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

最初几次到河南的时候，村民并不理解桂希恩的举动，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他，认为他肯定带有个人目的，因而不愿让他抽血检验。桂教授用自己行动改变村民的看法。猿岁的程金是河南最早被证实患有艾滋病的人，在村里他曾经饱受歧视。他到邻居家坐过的凳子被丢掉，村里人见了他就躲。隔壁老婆婆生病，他送去一挂香蕉，人家劈头扔了过来，“自己得了这种病，还想叫我们都死！”桂希恩颇费苦心地在村头和程金照了一张握手的照片，让他放在堂屋里最明显的位置，以告诉村里人，一般的接触不会传染。每到一个村子，他都要这样一点一滴、苦口婆心向村民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1995年12月，桂希恩进文楼村送药的时候，当地政府派警察来阻挠，好心的村民把他藏在自家的米缸里，午夜时分才护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对于类似的经历，他本人极不愿提起细节，“总之，高耀洁面对的压力，我都面对过。”桂希恩只是这样淡淡地一句带过。

桂希恩本是个简单的人，但一旦涉足艾滋病，注定要卷入各种不简单的事端中；他本是个低调的人，但又常常抛头露面，为艾滋病问题大声呼吁。近些年与艾滋病打交道的经历，使桂希恩自觉不自觉地被改变许多。只要是为了艾滋病，桂希恩宁愿如此，即便这些改变对他而言也许经常意味着“牺牲”和“妥协”。

1995年12月，文楼村的几位艾滋病病人来武汉求医。他们都是借粮度日的艾滋病病人，来的路费全是桂希恩提供。医院安排缘位病人住进一个即将拆毁的旧房里，但仍然遭到邻居强烈抗议。为证明正常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桂希恩将缘位病人接到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共用卫生间。在并不十分宽敞的三室一厅房子里，客厅摆着两张床，供病人住宿。每天三餐，他都与缘位病人在一张桌子吃饭。

为病人抽取血样，桂希恩也只能在家里进行，他本人也很无奈：“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危险。有两次在为艾滋病病人抽血时，不慎针头扎在手上，他并没有慌张，简单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万幸的是，后来化验表明，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缘位艾滋病病人在武汉，共收到圆缘万元捐款，还有价值近 员圆万元的药物。缘位艾滋病病人的到来，为艾滋病的医学研究提供了详细资料，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事件本身。远在美国的女儿看到父亲举动后，打来越洋电话：“爸爸，我支持你的行动，我为你感到自豪！”

桂希恩的经济账

没有人可以说清桂希恩到底曾为病患掏过多少钱，桂希恩也坚决拒绝外界任何数字上计算的尝试，因为“这些小钱不值得去算”。

桂希恩的正式身份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在医院采访时，另一个科室的人告诉记者，她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院长在某次晨会上说，“桂希恩从来没有在医院报销过路费”。医院疾病控制处的柳主任告诉记者，桂希恩个人的时间大都用在下基层。



摇摇圆园年缘月，桂希恩将缘名艾滋病患者接到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用行动证明艾滋病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艾滋病人需要关怀。

如果某地有疫情上报，医院通常会通知一些专家组团下去会诊，但有时桂希恩得到通知后就抽空自费下了乡，然后再跑回来交个报告，说“不用去了，我已经搞清楚了”。

在不少人眼里，桂希恩是位“怪人”。通常他拒绝报销外出调查的费用，他的理论是“这是我喜欢的事，我愿意做，就像人家出去旅游，也是自己出钱”。所以如果不是疾控处有时坚持帮他解决路费，这笔钱就是他的个人支出。据说医院的财务上从来找不到一张他报销差旅费的存根，接受义诊的人在他自费来看诊后连请他吃饭的机会都没有，同去的副手也只能在事后老乡的感谢中得知他那些私下的资助……从 1985 年到现在，他接触过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下 1000 人，以他的一贯作风，这些人几乎都受到过他的帮助，至于那些人的亲友、孤儿等等根本就没法去算。每次这些人来，他就会自费让他们去做检查，这项就差不多是 1000 元一个人。

不过在采访中向他核实类似事件，桂希恩都不假思索地予以拒绝。还是医院的工作人员讲了一个小插曲：1997 年夏天，桂希恩来到湖北荆州某村进行例行调查，看到当地唯一的水塔坏了，村民生活用水取自有钉螺（血吸虫的传染源）的河中，他非常着急。回到武汉后，桂希恩自己掏出一万元存款来修复水塔。一向不喜欢张扬的他，并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一年以后，桂再次来到该村时，看到损坏的水塔依旧如故，村民怨声载道，这笔钱不知被用作何处。桂希恩回到武汉向医院纪委投诉，希望能够通过组织将钱落到实处，此事才为人所知晓。

在此次关于桂希恩得奖后的报道中说，他资助了 100 个孤儿，不过其中有一部分钱是马丁出的。医院的同事说，关于桂希恩资助儿童的数量其实是难以计数的，有一次他们去随州，在一户农民家有两个痴呆儿，桂没作声就把地址详细地记了下来，随后暗地里的捐助。诸如此类的事，桂希恩从来不会对外人提及，都是同事们后来偶然从老乡嘴里知道的。桂希恩用在艾滋病上的钱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按他自己说的，“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是来自我的家族”。

桂希恩的金钱观，恐怕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许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医院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来自河南艾滋病病人程金到武汉治疗期间，住在桂教授家里，看到桂

教授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很难过。在离开武汉前，程金特意将武汉记者捐献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希恩的枕头底下。

很多熟悉桂教授的人说，你只要来到中南医院，看到一位穿灰衣服，大约有员米愿园个头的医生，再看看他穿的是布鞋，那肯定就是桂教授了。在医院，桂希恩给人的印象总是穿几件陈旧的衣服，骑一辆破单车。每次去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工作，为节省 愿圆元的车费，即使七八站路，他也总是骑自行车前往。

于每个得到帮助的人来说，这些钱的意义是具体的，但是，对桂希恩这样一个物质欲望极低的人而言，钱确实是作为概念来使用的：“我吃喝不愁，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桂希恩说，每月打在他个人账户上的工资，除了取出四五百块的生活费以外，剩下的钱，只要病人有需要，他就随时去取。

对一切需要他帮助的病人，桂希恩无法进行“成本核算”。科室的一些同事尊敬他，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他在医德与个人利益选择上的那种超然。桂希恩的存在，意味着感染科收治病人的结构中一定会有艾滋病病人。他们的存在，除了只能向他们收取低廉的治疗费外，对科室经济效益的影响更大程度上表现在病源的减少。谈及此事，一向坦然的桂希恩突然有了几分不安：“其实这么多年我对科室的同事是有愧疚的，因为我们科室的奖金在医院里总是倒数第几。”在这个经济效益为先的社会里，赚钱的能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在医院赚钱是在病人口袋里拿啊，我不忍心”。

“我选择合作”

桂希恩与高耀洁，可以说是民间抗艾滋病的两位标志性人物。这两位在艾滋病战线声望颇高的人士无论在公开还是在私下场合，彼此都给予对方高度评价，“我非常敬重她，她做的事情相当了不起。”桂希恩这样评价高耀洁，但同时也坦率地说，“我跟她的某些想法和做法有些不一样。”

高耀洁在谈及桂希恩时曾有过这样一句评价：“他不像我，什么都讲；但只要他讲出的话，就不是假话。”这其实也道出了高耀洁与桂希恩的些许不同。比照高耀洁相对激进的方式，桂希恩更希望采